

## 泛道德化批判之思:道德的越位与复位

冯 茜<sup>\*</sup>

【摘 要】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加速,人际关系范围扩展,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智能化、自媒体化推动了人际社会交往的内容与形式的变革,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开放性、互动性及异质性大大提高,虚拟社会在现代公共场域中的影响力呈现爆发式增强。这些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必然且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道德观念。有道德的生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和基本的诉求,因而道德评判是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因。道德批判成为一切批判的前奏,同时也成为净化道德生活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如果将道德评判推向极端,形成泛道德化批判,由此就会产生诸多非伦理问题伦理化等伦理越位现象。因此,新时代道德建设重要的突破口,就是明确道德边界,即道德实践与实践主体的有限空间明晰化,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道德批判观,将道德批判作为科学批判的价值引领,使道德批判真正发挥其积极引领功能,在差异性社会中寻求建立共同的利益机制,为重建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基础。

【关键词】泛道德化批判;道德边界;道德越位;道德复位;道德秩序

我国正处于历史性变革的新时代,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发展理念到奋斗目标,全方位地展开了巨大的变革和转型。同时,现代社会也是流动性社会,公共生活的开放性、异质性、互动性大大提高,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信息化、智能化、自媒体化使人们社会交往的内容与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虚拟社会在现代公共场域中的影响力呈现爆发式增强。道德问题已然成为反映当下社会问题的敏感窗口,伦理道德的巨变使得伦理困惑与道德越位尤为凸显。当面对社会不良、丑恶现象,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尤其是网络来表达强烈的批判态度,习惯性地从伦理出发,道德批判成为其他批判的始点。在这种批判中又普遍地存在着泛道德化批判之倾向。从表象上看,泛道德化批判试图用非理性的情绪化批判方式从而生发以偏概全的臆断;从本质上看,泛道德化批判又是一种道德边界模糊,从而忽略了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这是与唯物史观相抵触的思维方式。一种有效的科学理论必有其出场语境和功能边界,泛道德化批判在道德的范围内缺乏对道德层次的有效区分,跨越了道德的基本边界,从而导致道德评价和道德批判的越位和扩张。因此,应明确道德边界,即道德实践与实践主体的有限空间,明确伦理行为与非伦理行为的边界,进而确立相应的评价标准,以怎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道德引领现代社会生活,成为矫正泛道德化批判思维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为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批判观,将道德批判作为科学批判的价值引领,使道德批判真正发挥其积极引领功能,重建道德秩序,以社会

---

<sup>\*</sup> 冯茜,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210098。

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全社会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布阵筑基。

## 一、泛道德化批判引发对道德边界的考量

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sup>①</sup>由此可见，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同时，也生产着自己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然后才有政治关系、伦理关系和文化关系等。因此，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必然引起伦理道德的变化，这既是历史的客观顺序，也是逻辑的必然，更是实践的要求。同样地，在阶级社会中，道德的产生被打上了深刻的阶级的烙印，从属于不同阶级的人们，就会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评价标准。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如果我们看到，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即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各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那么我们由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sup>②</sup>与此同时，马克思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当时道德领域普遍存在着的抽象的道德观，即夸大道德的作用和泛化道德的内涵。夸大道德的作用是把道德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根本途径，甚至把政治等其他非伦理问题伦理化，认为只要有效解决道德问题，这样社会中存在的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后一种泛化道德的内涵是把道德视为高于人的永恒法则，这为旧势力维护其统治提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工具。依据上述思路，道德的发展是推动现实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我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型社会”，道德是维护社会秩序以及人格塑造的重要原则。虽然事实上更多地是“外儒内法”，但在话语层面上，道德立人极，道德统御一切。<sup>③</sup>儒家德性论文化传统使人们习惯基于伦理的视角，从道德着眼，坚信道德力量是规范行为和改造人心的决定性力量。随着我国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迅猛增长，但是强国之强，不仅在于经济的现代化，更在于人的现代化；不仅体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硬实力，还体现为文化与文明方面的软实力。然而在当下社会，我们却不难看到，对现实道德状况的怀疑论倾向与对道德未来的悲观心态日益蔓延，其中产生这种道德怀疑论和悲观心态的重要方法论原因正是泛道德化批判思维所致。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已迈向21世纪的发展进程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调整，新旧道德思想观念激烈碰撞，特别是价值观多元分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错误的价值观恶性扩张，在道德意识层面却呈现道德认识的模糊、道德评价的混乱、“道德滑坡”论等，使人们产生了严重的道德焦虑感和由此引发的强烈的道德批判冲动，这些道德批判往往只注重从某种固化的道德标准评价社会现象而忽视了另一个问题即道德的适用性问题。正如过去把一切现象都作“姓社姓资”“非马即修”等意识形态的区分和判断，从而导致意识形态的泛化一样，如今也普遍地存在着把一切行为都用善与恶的道德标准加以评价，从而导致泛道德化批判倾向。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具有绝对的约束力，甚至出现道德法律化，几乎人的所有行为都属于道德评价的范围，道德评价成为最高的和唯一的评价，这种极端化反而使道德失去了其应有的调节和引领功能，因为万能的存在往往就是无能的存在。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生活的分类、分工更为精细，人的行为更为复杂，有许多现象并不具有伦理的性质，即不能简单地用道德的善或恶来评价。而泛道德化批判是把所有社会现象道德化，再通过理想化、双重化的标准对其进行道德评判的一种批判方式，其认识论特征是，在道德外延上将非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434页。

③成伯清：《我们时代的道德焦虑》，《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5期。

伦理现象伦理化,在道德批判方法上将特称判断全称化。<sup>①</sup>以简单否定和消极解构为表征的泛道德化批判正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道德以及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悄然蔓延,已经构成培育良好社会心态、凝心聚力实现中国梦的巨大障碍。甚至原本属于法律处理范畴内的问题,人们在思维时还是习惯性地从道德层面出发,以简单的道德谴责来替代严密的法律思考,制约了问题的有效解决和法律的完善。

人的共生性本质决定了过有道德的生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和基本的诉求——虽然不同时代具体的道德诉求具有差异性但并不否定道德自身的必要性,因而道德评判是人的社会性生存和人类发展前进的重要动因。不过,如果过于依赖道德评判,让其逐渐走向极端,使其万能化,变成了泛道德化批判,则可能会事与愿违。任何事物的合理性都有其客观的界限,界限一方面是对其功能的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对其价值的尊重和保护。无边界地扩大其应用范围,在生活中将其滥用,势必导致其走向反面。<sup>②</sup>任何一种思想的形成,都伴随着思维方式的转换和变化,就思想本身的呈现而言,思想的具体表达是表层内容,更为深层次的是对其内在思维方法的研究。人类社会现象纷繁复杂,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现象可以划分为道德现象和非道德现象。就不同对象而言,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在这里道德现象是指人类现实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用善恶标准去评价、依靠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维持的社会现象。<sup>③</sup>伦理评判或道德评判的对象只能是具有道德意义的现象,自知性、自愿性和利害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伦理现象的基本要素。<sup>④</sup>也就是说,用道德标准来衡量道德评价范围内的伦理现象,而道德以外的现象则用其他方式来进行认识评价。这一原则为理解和评价现代社会个体行为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尺度,它避免了行为评价标准的混同与混乱,对现代社会的道德重建和个体道德生活的展开都有着积极意义。涂尔干曾指出:“道德正在经历着骇人听闻的危机和磨难。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构竟然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其速度之快、比例之大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与这种社会类型相适应的道德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影响力,而新的道德还没有迅速成长起来,我们的意识最终留下了一片空白,我们的信仰也陷入了混乱状态。”<sup>⑤</sup>涂尔干在此一方面揭示了道德对人生所具有的安身立命的意义,因为道德是人的信仰;另一方面又告诉我们在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必然伴随着巨量的道德问题和人们道德评价的困惑甚至混乱,这一混乱突出地表现在道德标准的不确定性上,这一不确立性带来了道德评价最终可能走向更严重的道德焦虑与道德混乱。

## 二、泛道德化批判的道德越位

正处在社会加速转型的当代中国,伦理道德已然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道德对社会生活有着广泛的渗透性,同时对社会关系调节也起到无可替代的特殊功能,道德的变化成为反映社会转型的窗口和敏感纽带。通过伦理道德不断变化的过程,能够管窥社会转型的价值向度,也就是说,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社会转型进行有效评价,同时也是评价的重要依据。当下我国社会泛道德化批判思维盛行,不论是在道德实践还是在伦理理论方面,都存在道德的随意泛用、道德的不道德(即道德绑架)等倾向,这也凸显出明确道德边界的重要性。

### (一) 泛道德化批判客体对象和功能的越位

从伦理学角度来看,所有的社会行为分为伦理现象和非伦理现象,对于社会伦理现象,能够进行

①刘小华、黄明理:《泛道德化批判思维成因论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年第3期。

②黄明理:《马克思主义魅力与信仰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77页。

③罗国杰:《伦理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页。

④黄明理、杨斌:《马克思主义批判观与泛道德化批判的反思》,《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⑤[法]涂尔干:《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渠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1页。



道德评判,但如果是非伦理现象就不能简单地套用道德批判,这就需结合其他批判手段,如政治批判、制度批判等,而泛道德化批判这种评价方式是在没有甄别伦理现象与非伦理现象的基础上将一切现象伦理化的思维方式,进而无限放大了道德的功能。

首先,当前社会舆论特别是自媒体舆论领域“道德万能论”倾向突出。凡社会热点问题舆论都会把目光聚焦于道德领域,人们往往习惯于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置于道德显微镜下观察,把无伦理意义的生活现象也赋予其不应有的伦理性质,将伦理评价化,凡事皆从道德层面去寻找原因,偏好于把所有社会问题归因于社会道德上的缺失所致,理所当然地认为道德问题是社会问题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无疑夸大了道德的功能,赋予道德以不能承受之重。如,网民在微博发了一张图片:两名穿着呢子大衣的年轻女孩蹲在上海地铁站台上,似乎正在刷手机,并这样评论“可能我老了,很多事情比较保守,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为何现在那么多女孩子不懂得教养?”随后这条微博被不少“大V”转发后,在网上立刻引发热议。蹲着是否与教养有关,应就事论事,而不能一概冠之以“没教养”。如果夏天,女孩穿着裙子或者是短裤在公共场合蹲着,有碍观瞻。但初春时节,照片中两名女孩子穿着棉衣,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也不会让周围的人觉得难堪。细想假如这两名女孩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繁重的工作,疲劳困顿,或者一直站着乘地铁,趁转车的机会蹲在地上歇歇,这是很正常的事,由此指责她们“没教养”,恐怕不妥。把“蹲着”和“没教养”扯在一起说事,无疑是将非伦理问题伦理化了,这是泛道德化批判之典型表现。

其次,法律问题道德化。一般道德与法律作为行为规范,二者在内容上存在着交叉,功能上存在着互补性,但它们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规范——这正是二者各自存在的价值所在。二者的调节原则和维持力量都有着显著的不同,道德调节的价值取向是利他,主要依靠道德主体内在的道德自律,即自觉与自愿。法律调节的价值取向是不损他,主要依靠外在的他律,即外部的刚性力量。现实中法律问题道德化突出地表现在,出于对强者的道德鄙视或对弱者的道德同情,将法律问题演变成纯粹的道德问题,用道德评价代替法律评判,以道德舆论作为法律裁决的主要标准,以明晰的法律为准绳的法庭演变为以尺度模糊的道德为标准的道德法庭。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道德之恶”与“法律之罪”的博弈,所谓的“道德之恶”实际上表面是道德问题,而实质仍然是法律调整的范围。道德超越其自身的伦理边界,无节制地渗透入法律并导致道德与法律的边界不清晰。一旦过于考量道德舆论的尺度,就会使法律的公正性被所谓道德的公正性所取代。而道德的公正性又是具有主体的差异性和主观性,由此不但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被破坏,归因的错位严重地制约了法治的建设与完善,使依法治国战略虚化,而且道德也因此而异化为令人恐怖的存在,最终使道德和法律都难以有效地发挥各自应有的功能。黑格尔认为道德是“意志在自身中的反思”<sup>①</sup>,它仅仅具有主观性的环节。一个人做出犯罪的行为,理应得到法律的惩罚,如果罪犯打了法律的擦边球没有得到惩罚,那么也应该通过分析和论证法律的纰漏,绝非凭着感性的民意和义愤,妄图凌驾法律之上。

## （二）泛道德化批判的道德主体的理性自觉缺位

与其他协调社会关系相比,道德是低成本进而也是更为文明的社会治理方式。道德作为社会治理越来越倚重的一种调整方式和手段,其价值的实现集中体现在社会各构成要素间的相互作用。社会成员基于自身的道德认知建立起对道德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从而实现道德这一社会治理手段的有效性。道德之为道德其根本属性在于其主体的自觉自愿,正如马克思指出:“如果我根本不存在,我又怎么能成为有德行的人呢”。道德作为实践精神,首先表现为一种价值,它是道德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

<sup>①</sup>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8页。

要的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sup>①</sup>人作为道德主体在对道德进行反思和实践过程中实现对自身在道德领域的主体地位、能力和价值等的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sup>②</sup>当下道德实践中人的主体意识发展与道德理性自觉呈现出后者严重滞后进而二者非同步性、非协调性倾向。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集体主义道德意识建立在公有制经济基础上,它将个人与社会融合成一个整体,个人的主体地位和道德价值的实现是以集体利益的实现为基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简单、片面地践行集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让人的主体性几乎淹没在集体中,道德的个体利益动机被视为“恶”,这时的道德主体是以抽象的集体作为存在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道德观念的调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受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在物质利益的诱惑和刺激下人的主体意识被激发,进而深刻反思传统道德的合理性。市场经济的自由、平等,严重冲击了集体主义时期集体利益至上等价值取向,个人意识逐渐从集体意识中分化,道德主体开始以个人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中,其地位和价值的确认通过个人的利益以及个人权利来表现。

不难看出,人们要从个体对集体的依附性关系而形成的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信仰中摆脱,就需要充分发挥道德主体的理性自觉。自觉是指“人们的个人觉醒和自我意识的确立”<sup>③</sup>。然而,在主体自我觉醒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素影响,并不能与道德觉醒、道德理性自觉与道德担当形成同步化发展,一方面由于个体自我意识过度膨胀,另一方面却是自我道德自觉与自律缺失。与经济、政治、法律等这些可以制度化的社会构成要素相比,道德基本上是以信仰化和知识化的形式存在。这就预示着主体在某一时期内可能会出现脱离道德理性,片面地单向度发展,这也导致部分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物质利益忽视甚至践踏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正如马尔库塞所言,人们思想庸俗化和单向的趋势的现象,抑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整个社会失去了否定性和批判性思维原则,人们内心的批判性、超越性思想也受到抑制。<sup>④</sup>虽然过上了舒适、充裕的物质生活,其精神生活却是贫乏的、空虚的。原有传统的集体至上的道德价值信仰被弱化后,新的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辩证统一的新道德价值理念尚待形成,人们的道德主体的理性自觉和道德主体担当意识缺位,这样一来,便使如下现象呈现出普遍化倾向,人们一方面觉得不能忍受失德现象,另一方面又缺乏道德自觉担当意识,于是人们习惯于当道德的裁判员而不是道德的运动员,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行使道德的裁判权,对别人是道德要求从严,持道德否定的态度,而对自己则是道德要求从宽,持道德肯定的态度。

### (三)越位的道德绑架

道德需要是人类特有的高级精神性需求,它构成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灵魂部分,人们践行道德规范的目的是通过它而收获精神的满足。在道德形而上学体系中,健全的伦理精神的形成经过两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和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个体、通过集体逐渐向实体发展的过程;第二个环节是由实体向主体的辩证发展。<sup>⑤</sup>道德的主体不仅仅是个体,而且还有实体,即具有伦理性的集体。马克思曾指出:“要有共同的目标,要为共同的目标而生活,同时又要像人一样做出现实的、独立的选择。”<sup>⑥</sup>人是以个体生命的形式出现和存在的,实践具有现实性即经验具体性。有了明确的道德目的,必然会推动道德向实践过渡。只有过渡到道德实践,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道德规范的有效性。

在道德实践过程中,道德主体在行为实践中自主选择其适用的道德规范,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自

①杨嵘均:《论行政伦理规范体系建设的主题及价值目标》,《道德与文明》2011年第4期。

②陈勇、武曼曼:《道德主体意识的哲学反思》,《伦理学研究》2015年第6期。

③高海清:《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81页。

④[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28页。

⑤樊浩:《伦理的实体与不道德的个体》,《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5页。

由构建,具有绝对的自由性。自由不容对立性的命令,因此道德规范的“应当”形式必须加以改变。<sup>①</sup>纵观当下道德实践,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和传播,网络舆论呈现人人皆是麦克风的“非理性繁荣”景象,道德绑架现象屡见不鲜。目前学界对于“道德绑架”尚未有权威的定义,《伦理学大辞典》中亦没有收录有这一词条,鉴于生活中道德绑架的境遇以及语义分析,道德绑架是指人们以行善的名义,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sup>②</sup>道德绑架由主体(施绑者)、道德绑架的对象(被绑者)和主体要求对象履行的行为构成。道德绑架实质是一种“愿望的道德”,也是评价标准理想化和标准双重化的外化表现。在多元化的网络时代,尤其是在高度关注民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它还将长期处于利益调整期和社会矛盾叠加暴发期,基于民粹的道德批判必然存在着,且还会有进一步发展之势。<sup>③</sup>不难发现,经常会有人抢占道德高地,媒体和网民成为舆论的放大器,道德绑架的主体即道德绑架行为中的实施者以自我道德标准去衡量他人的行为,把“应该”变为了“必须”,“一般的道德义务”变为了“超义务”。一旦发现他人在行为和观点上出现了与自己不一致的情况,他们就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其进行道德审判,并对他人提出某种被批判者无法做到的道德要求。

一般而言,道德绑架的出发点通常是“善”,其行为动机是为了履行道德正义,维护弱势群体的真正权利。许多道德绑架者通过社会舆论的力量,敦促社会精英阶层或者有一定话语权的人向弱势群体伸出援助之手,在实施道德绑架的过程中,不仅是公开绑架,同时也表现为理直气壮,把自身视为正义的化身,公开指责他人,完全不顾及他人尊严与个人人格。越位的道德绑架,其实是武断地定性了道德主体,人的好与坏的本性,而且让人沦为了避免被攻击而有意识地克制自己的大脑的念头,这与其说是维护正义,不如说是对道德内涵的极大贬低。常见的道德绑架诸如“逼捐款”“逼让座”等,以尊老爱幼为名义,用一些使被道德绑架者自尊受到伤害的方式(这些方式其实也是不道德的方式)逼迫其做出自己不情愿的行为。在这里涉及一个问题,即道德评价和道德绑架是否一致。虽然从表面上看,二者之间有着共通之处,都属于道德判断,具有约束性、规定性,对人们的行动具有规约的作用。但二者本质上不同,道德评价和道德绑架所用的道德标准存在着差异性,因此,动机、态度以及产生的结果也存在着很大区别。其中,道德绑架的实施者主要是从道德制高点进行绑架和批判,相对于道德评价来说,标准要高很多,道德绑架所用的道德标准高于道德评价所用的标准,道德绑架的道德评价标准是超现实的高标准。有效的道德评价是以尊重为前提的劝善,道德绑架则是以伤害对方道德自尊和剥夺对方道德自由为前提的道德谴责,因而,道德绑架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反而使被道德绑架者以更非理性的甚至是更不道德的方式维护自尊。因为一旦道德行为失去了主体自觉自愿即自由选择的性质,它就丧失了道德的价值,进而也就失去履行的意义与必要性。

### 三、道德泛化的回归:道德秩序及其人化重构

时至今日,人们把目光转向道德精神领域,转向道德的复兴和重建。道德的功能在于处理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相互关系以达到和谐、人人生活得美好,为此,现代道德调节的本质特征首先是权利与义务的相互性。关于道德关系单向性的权利与义务二元对立论的思维是有悖现代道德本真的,就道德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功利与超功利辩证统一、道德权利与义务共生相成的交互性生长,在特殊情形下自觉牺牲个人物质利益以追求更高尚的精神利益的道德公正公平才是健康合理的道德发展方向。

第一,客观审视道德的边界和功能,反对“道德万能论”“道德无用论”的论调。在我国漫长的历史

①崔平:《道德的边界:对道德理想主义的一种理论限制》,《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②覃青必:《道德绑架内涵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

③黄明理:《论民粹化网络泛道德批判》,《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发展过程中,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使人们习惯性地将存在的问题都归因于道德,形成了强烈的唯道德化倾向,这种将道德泛化进而泛道德化思维表面上看是极其重视道德的调节作用。但道德本身是有其功能边界的,让道德承担它所不能承受的重任,特别道德最终是属人的道德,如果道德最终成为阻遏人性健康发展的消极力量,甚至使道德走向反道德——封建社会道德法律化所带来的道德吃人现象便是例证,那么,道德终被人们所抛弃。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个体主义、极端的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这些基于市场经济的消极价值观有了滋生土壤,有些人对传统道德和革命道德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赤裸裸地鼓吹道德虚无主义和“道德无用论”。部分人为了达到目的,选择不择手段,甚至将信仰、道德、良心、人格等抛之脑后,造成社会中诸多道德滑坡现象,严重影响社会道德的良性发展。道德是以自律和舆论监督等为力量的特殊调节社会关系的工具,它有其特定的合理边界。因此,应明确地、客观地认识道德的作用和地位。一方面,反对故意夸大道德的作用;另一方面反对“道德无用论”,否认道德的价值,否认道德在社会调节中的作用,这是道德秩序重建的出发点。

第二,以道德人格的塑造和健全为核心,修养“道德新人”。回溯历史,我国曾出现诸多人格健全、道德良好的英雄人物,在思想和人格上都成为大众典范,比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他们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和人格。但传统道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重整体利益、轻个体利益,培养服从、顺从型道德人格。革命道德文化同样是强调个体无条件服从集体的价值取向,这是当年战争年代特殊环境下个人利益依附于整体利益环境下不得不如此选择,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大善与小善之间的悲剧性冲突。以上两种道德传统的共同特点是轻个人利益和自由,注重主体基于对整体利益至上价值认知的理性自觉,而非将道德信守建基于主体对道德于我的安身立命全部意义感知基础上的情感自愿。道德更重其社会调节和稳定功能而轻道德对个体生活的意义,因而,道德更多地展现出外在的消极约束有余而内在的积极自律不足。利益调节的价值取向应当随着个人与他人、个体与集体利益关系的变化发展而与时俱进,在新时代里,二者发生悲剧性冲突只是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个体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体利益与利益集体总体上呈现出非对抗性矛盾的性质,他们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共生依存的趋势,彼此互为道德价值过滤器。道德也不再是熟人圈基于狭隘的功利考量的利己工具,道德既是人幸福生活必备的条件,无德之人不可能得到他人的善待,进而他无法获得作为有尊严的人所应有的快乐与幸福;同时道德更是人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人幸福与否最重要的价值评价标准。道德人格是道德重建的核心所在,通过不断努力,打造出一代具有个性化、独立自主的道德新人。道德新人不再是被外在塑造出来的,而是主体能动地自我完善的结果,不是“要我做人”而是“我要做人”。随着新时代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人们的生活追求已由生存型向发展型提升,精神性尤其是道德需要日益上升为诸需要中的需要。伴随着人们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主体意识不断觉醒,道德主体自主、自由选择适合的道德规范并诉诸行为实践,这也为道德秩序的重建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在差异性社会中寻求建构共同的利益机制。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指出,目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求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诉求日益明显,特别是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情况下,社会分工日益多元化,进一步引出了人的利益的多元化,造成了经济领域中经济发展和民生发展的失衡,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社会价值共识。道德是价值共识的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塑道德观念,是中国价值信仰和道德根本之所在。价值观的多样性是利益关系多元化的体现,价值观的对立是利益冲突的反映。因此,价值共识的深层基础应是共同利益的建构。<sup>①</sup>归根到底,如何实现价值

①莫凡:《当代西方思潮核心价值认同的利益机制及启示》,《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3期。

共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新时代的社会背景下,建构合理的社会道德回报机制,创造德与福、祸与恶之间的客观因果规律实现的条件,更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自愿性,培养其道德回应和道德担当的主体意识。同时,革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的方式和方法,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经济基础,寻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认同的利益机制。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对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进行合理调整,从而让全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四,将马克思主义科学批判观和伦理学理论纳入到国民教育。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批判应是科学批判与价值批判的统一,所谓批判的科学性是要求道德批判应当建立在反映事物本质的“事实”而非“事例”的基础之上。因此,需要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建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批判观,同时将伦理学理论纳入国民教育。道德是作为一种隐形公共资源,起到维护社会秩序和谐稳定的作用。伦理道德问题的解决需要科学的伦理学理论来指导。由于传统社会中人们容易被蛊惑、思想易被统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主张民主、自由、平等发展,在社会道德建设过程中,不仅需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同时还要符合人性完善的要求,僭越这些理性精神,就会回归非理性道德精神,泛道德化倾向就会无法消除。特别要公民真正理解道德的边界,正确处理道德动机与道德效果、道德目的与道德手段之间的关系,既不走向唯动机论,将自利动机无条件纳入于自私范畴,也不陷入唯效果论或个人功利主义的误区,以自我利益的实现作为道德评价的唯一标准,使占据意识形态高地的道德拥有较少泛化的空间,进而确保其健康发展。

(责任编辑:杨嵘均)

## A Critique of Pan-Moralization: Putting Morality in Its Right Place

FENG Qian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with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accelerated,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have been greatly expanded. In particular, the gradual populariza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self-media has brought about tremendous changes in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ccordingly, the openness, interactivity and heterogeneity of people's social life have been greatly enhanced and there is an explosion of the influence of virtual society formed in the cyberspace on the public sphere. The area which is the first to have surely felt the impact of these changes is morality. It is a common and basic desire for the people in a community to live a moral life so that moral judgments form an important force promoting the social development. Moral criticism is usually the prelude to other criticisms and at the same time become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pursuit of a purified moral life. However, if the moral judgment goes to the extreme of pan-moralization, many issues outside the sphere of morality will be moralized and the abuse of morality will be inevitable. Therefore,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ity in the new era is to first define the boundaries of morality, i.e. to make an explicit definition of the sphere for people's moral practice.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it is necessary to stick to the scientific Marxist concept of moral criticism, make moral criticism scientific and based on the facts, enable the moral criticism to fully play its guiding role, and seek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mmon interest mechanism in a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different interests and pursuits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moral order.

**Key words:** pan-moralistic criticism; limits of morality; abuse of morality; restoration of morality; moral order